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年第2期 JOURNAL OF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o. 2 2005
(第4卷) (SOCIAL SCIENCE EDITION) (Vol. 4)

大字报中的传播变异及权力关系

刘若辰

(吉林大学 研究生院, 吉林 长春 130012)

摘 要: 大字报是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现象。大字报作为一种特定的传播模式, 在历史探源的基础上, 因其自身的传播特点、社会功能和外界因素而导致传播变异。权力介入传播领域而出现的两者交汇繁衍, 导致权力和传播的双重失控; 群体参与的无序状态与狂热状态波澜互推, 民主的舆论转换成集权的暴力。

关键词: 大字报; 传播模式; 群体; 舆论

中图分类号: D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0202(2005)02-0100-05

大字报作为一种并不久远的历史上的传播现象, 它的产生有特定的时代情形, 这个情形已经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而不复存在了, 因此大字报对于当下新闻传播的研究价值被忽略也就不足为怪了。但如果认为历史是僵死的事件未免武断且失于肤浅, 大字报作为某历史阶段的特定产物, 仍然具有探讨价值。

一、研究对象界定及历史回顾

"在现代社会, 大字报不该算是什么重要的媒体, 但在二十世纪中叶的中国却是不能小视的。"[1] 一部论述中国百年媒体变迁的著作是以这样的文字开始评介大字报的。

目前无法找到关于"大字报"的确切定义, 在《中国现代史词典》里, 一个"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条目。它是这样解释的: "简称'四大'。我国1957年反右派斗争及'文化大革命'中所采用的几种群众运动形式。"在下面的详述中, 和大字报相关的文字的是这样的: "……尤其是大字报无助于人们对各种问题进行冷静的、切实的民主讨论, 很容易被少数人利用, 为它们提供诽谤、诬陷、侵犯他人人格尊严和其它民主利益的工具, 不利于建设社会主义法制, 影响安定团结。"[2]

这种解释, 是一种历史学视角的解释, 它深深打上了历史评判的烙印, 止于历史现象的描述, 并且是后置视角, 没有在本质上给大字报做出定义。从传播模式的角度来研究大字报, 应当首先下一个传播意义上的定义: 大字报是指写在纸上, 粘贴在公共场所, 表达意愿的传播形式。它是纸质传播媒介的一种特定状态。体裁可以随心所欲, 诗歌、杂文、政论、漫画不一。信息传播主体既可以是集体, 也可以是个人; 既可以署名, 也可以匿名。

考察大字报的发展, 概括说来, 它的起落经历了两个高峰——第一次高潮是起始于1957年"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 经历"反右"、"整改""双反"(反浪费、反保守)、"大跃进", 低落于58年大跃进从口号落实到行动之后, 特别是随后三年困难时期的到来; 第二次是1966~1976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五个转变的过程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或者从无序到有组织的过程); 从舆论监督的功能到揭发批判的功能的过程; 从分散到集中(专栏的粘贴、汇编的出版等)的过程; 从青春的冲动到政客的操

收稿日期: 2004-11-21

作者简介: 刘若辰(1983-), 女, 吉林大学新闻学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大众媒介研究.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

纵的过程；从完全民众言论到与正规传媒互动的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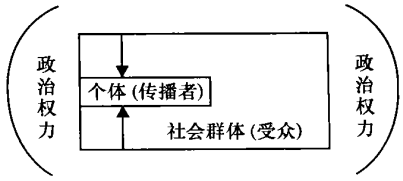
大字报的出现有着它的政治背景：中国共产党要开始第四次“整风运动”。因而出现了所谓的言论自由大民主的“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前两个是对于言论的号召，后两个是实现言论的形式。广大的群众——尤其是敏感而热情充满社会关怀和青春躁动的大学生——必须要有自己的发言形式，事实上，“他们很快就找到了一个发表自己言论的方式——写贴大字报。”[3] 所以，在一开始，意见和思想的传播就混合着两种源头：当权者的政治意图实现“大民主”和民众的言论自由愿望。从两方面看，都是以提出批评、指出缺点为目的而出现的大字报，实际上是起到（或者说希望起到）舆论监督的功能。而这种功能从一开始就是得到了被监督者的认可，甚至是由被监督者提出的。

大字报和权力之间的关系不是单向受益的，而是双向互动的。在它被赋予最大的权力的同时，它也为权力提供了钩斗的平台。而这种本领正是上一个阶段以来以大字报传播模式为典型的环境中培养出来的。在文革中，大字报沦为了党同伐异的武器。从大民主走向了它的反面，一面是声势浩荡的批判，另一面却不允许有异样的声音出现，一旦出现，对大字报则覆盖、撕毁、批判，对作者则关押、动刑、审查。事实上，谁都知道，民主的实现需要完善的制度建设，而舆论的功能在于监督，使之完善，而非越俎代庖。

二、分析传播模式看传播变异

既然是从传播模式的角度来研究大字报，抽象出一个传播模型是必要的：

这样的模式是非常简单的。它的特点是：信息传播脱离了媒体的中介作用，个体成为直接的发言者，直接对受众发言；传播者本身又组成了受众，他是受众群体的一部分；政治势力的外在干预无所不在。



大字报的传播模式

大字报作为民众发表言论和传达意见的传播模式，它是没有掌握话语权的民众在产生强烈的表达需要后，不甘心只做受众，进而用一种特殊的简便的传播模式表达自己的意愿。在这种传播模式里。受众和传播者的界限不再清晰，而是融合成混沌的一个整体，一切传播渠道被最大简化，信息被最大限度的“保真”。正是由于省略了“把关人”的角色，结果很容易走向两个极端并存的局面：最真实的信息和最无稽的信息同台献艺。没有“把关人”并不是说没有了操纵者，政治意图恰恰趁虚而入，弥漫开来。

这种传播模式的功能主要有下情上达、互通声息，以及舆论监督、政治斗争作用。保证下情上达通畅无阻，社会利益团体和成员之间的互通声息，是任何社会正常运转所必不可少的。在科层体制当中，在民主制度之下，应当通过稳定的信息流通渠道来实现，而当这样的渠道被堵塞或者信息通过这个渠道会被扭曲的时候，人们就会找到自己最原始的传播媒介。理解一种传播媒介，远远比理解一次传播的具体内容更为本质。“大字报”不是一次传播内容，而是一种传播模式，是一种媒介的方式。它不只是政治家的一种策略的产物，它还有它自身的社会生成力，因为当它“在不同的利益主体之间沟通消息的同时，自身不知不觉成为政治体系的一部分，对政治产生影响和作用”[4]4。这种作用，首先表现为“舆论监督”。但这种传播模式遭遇了它的尴尬：监督者的监督权正是来自被监督者，而不是在法律保障下的两个平等的主体之间的一种相互行为。因而，这实质上是一种自律，而非监督。被监督者实际上掌控着监督的限度。大字报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这种舆论监督的理念，即使在今天还在起主导作用。传媒人孙玉胜谈到：“电视制作人员要树立明确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

的大局意识，责任意识。这种大局意识的集中体现就是节目要符合党的方针政策，符合人民的利益。形象的说法是‘喉舌意识’。再明确的说法是‘只能帮忙，不能添乱’。”学者刘华蓉在其著作《大众传媒与政治》论述“舆论监督”部分，也有这样的论调：“领导干部的水平是影响舆论监督的重要因素，他们掌握着人民赋予的权力，对舆论监督而言，这种权力是用来鼓励、保护舆论监督，还是用来压制、打击舆论监督，对发挥新闻的舆论监督作用具有关键性的影响。”[4] 175可以看到舆论监督的主体从大字报时代的民众变以媒体作为中介的“媒体－民众”联合体，而监督的深层模式并没有根本转化。

它的第二个政治作用就是政治斗争。传媒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的历史，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几乎和传媒自身的历史一样久远。在中国一百多年的革命进程中，传媒一直充当着革命的先锋。大字报之为传播模式，更是有它的便于战斗的特性——广泛的参与性，极强的互动性，讯息的及时性，形式的简便性，内容的包容性和激烈的对抗性。任何识文断字的人都可以写可以看，凡是公共场所都可以粘贴，赞成和反对的态度极其鲜明，对抗的刺激符合受众亢奋的心理和整个火药味浓烈的社会氛围。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传播本质的变异。它的变异归结表现为几个方面：信息的虚化和意志的强化；现实的遗忘和想象的生长；自由的背离和专制的胜利。

从大字报的情况看，传播的目的主要不是告诉人们基于事实的确切信息，而是传播一种立场、一种态度、一种情绪。“无限热爱”、“无限愤怒”、“彻底打垮”、“轰轰烈烈”、“你死我活”、“决不手软”、“造反有理”、“揪出”、“砸烂”、“摧毁”……我们看不到从容，且事实也早就不顾了，道理都是武断的。罗汉平在《墙上春秋》中写道：“大字报的主要功能，一是揭露，二是批判，前者可以无中生有，断章取义，后者可以随意上纲上线，乱扣帽子。”

三、超越模式表象看权力关系

在考察大字报传播模式过程中，一个显著特点是权力的纠葛，进而出现两者的交汇繁衍，导致权力和传播的双重失控，以及群体参与的无序状态与狂热状态波澜互推，使得民主的舆论如何转换成集权的暴力。而这些，也具有超越历史的意义。下面将从舆论和群体的关系试图来清理这种意义。

《乌合之众》的译者冯克利在他的“中译者序”里写道：“群众的民主权力就像一切个人权力一样，当它没有受到恰当的宪政约束时，也很容易转变为它的反面，成为一种暴虐的权力。”作为一种动员了全民参与的传播模式，当大字报被当作实现“群众的民主权力”的一种形式，而没有受到“恰当的宪政约束”，它确实激发起了这种“暴虐的权力”，从舆论监督变为揭发批判，用暴力语言催生暴力行为。

大字报的时代，有它特殊的社会氛围：把现实妖魔化、把未来浪漫化、把革命激情化、把领袖偶像化、把私人生活最小化、把社会生活简单化、把阶级斗争夸张化……在那样的环境中，人们的思维模式是战争的思维模式。战争的思维模式主要有这样一些特点：“敌”“我”对立。它把人划分为两个群体，把社会划分为两大部分。“生”“死”对立。既然是敌我矛盾，当然强调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没有一种和合共存的思想。高度紧张。既然矛盾不可调和，生死悬于一线，危机四伏，放松警惕就是自取灭亡。崇尚暴力。对敌人宽容就是对同志残忍，从艺术到现实，都歌颂暴力的英雄。

这些思想也渗透在大字报的字里行间。纵观大字报的历史，虽然在内容指向上或有不同，因时因人而变，但是思维模式却是完全一致的。而这种战争的思维模式是属于一个群体性质的，作为个体无法产生。在那样的环境中，私人生活被挤兑干净，并导致了独立思考的极度削弱——这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

当然是整个社会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等因素的综合结果。在这些综合因素中，大字报只是很不起眼的一部分，但是它本身却具有双重的身份：既是群体性思维产生的一个结果，又是凝结群体的一个因素。这双重的身份，从下面的一个小事件中可见一斑：文革伊始，北大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后，“从 6 月 1 日到 6 月 5 日，北大校园内共贴出 5 万多张大字报……看大字报，学习‘革命’经验的日达数万人……去北大的交通为之阻塞。”当时在北大的学者季羡林在回忆录中形容道：“人的海洋，大字报的海洋，五光十色，喧声直上九天。”分散的人群通过大字报有了一条心理的纽带，而这条心理的纽带又不断地把更多的人捆绑进来。

对于群体，法国社会学家勒庞认为：“聚集成群的人，他们的情感和思想全都转到同一个方向，他们自觉的个性消失了，形成了一种集体心理……异质性被同质性所吞没，无意识的品质占了上风。”[5]16理性永远是个体性的，是冷静的，躁动的群体如同汹涌的岩浆，因此“给群众提供的无论是什么观念，只有当它具有绝对的、毫不妥协的和简单明了的形式时，才能产生有效的影响。”[5]44大字报的传播模式符合了这种片面化的要求，因为它的内容不是来自社会生活本身，而是来自被战争思维模式凝固了的头脑；它不是冷静分析的结果，而是政治狂热的产物；它不是言论的公共论坛，而是政治斗争的有力武器。

传播失控所制造出来的舆论是可怕的，会使想象的世界变成为“现实的”世界。对于这一点，早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美国新闻学家李普曼在他的《舆论学》中克制的表达了这样的担心，他认为作为个体的公民，其视野总是非常有限的，他说：“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设想这样的景象，即所有的人都会对整个超出视野以外的环境了解得那么清楚，致使他们对政府得全部事务自然而然地都能产生健全的舆论……”[6]208而作为产生舆论的群体，“我们不仅必须去观察我们的视野所及的更大的空间，超越我们所能感觉的更长的时间，而且我们还必须去描写和评价我们从来都数不清或想象不清的更多的人，更多的行动和更多的事情。”[6]98这在当时，根本是不可能的，当时人们拥有的只是现实的蒙蔽和坚定的信念。

作为历史的后设者，常常怀有恬美的信念，“无论如何，那个年代，人们都是真诚的”等等。但是，群体的信念恰恰是不安的和危险的，因为马基雅维利早就指出“领袖们通过经验懂得，只有当信念发挥了它们的作用时，他才能用它们去调动一群百姓，信念中的情感指向一个共同的目标发泄，真实思想的特性就被抹掉了。”大字报里，无产阶级的指向是它的一切“敌人”：地主、右派、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叛徒、内奸、工贼……名目繁多，眼花缭乱。这里暗含了群体的一种斗争策略——贴标签。贴标签符合群体的思维模式：简单化、片面化、明确化。这项工作也是由传媒来完成的。戴维·巴特勒说：“通过大众传播媒介的‘社会反应’夸大和歪曲了现实……这样遭受污蔑的群体相对来说是无权的——他们是年轻人、穷人和局外人。”这就是他所谓的传媒中的“固定形象”现象，事实上，这种“固定形象”的现象也是媒介本身面对的一个痼疾，一个固定的形象必然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抽象和扭曲，而接触媒体的人会自然而然的把它当作真实的生活。这就是理论上的“信息环境环境化”。这种理论假设，美国传播学者巴伦·李维斯和克利夫·纳斯通过大量细致的试验研究，用结论证实并称之为“媒介等同”。这种斗争策略在大字报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所不同的是在巴特勒那里遭受污蔑的群体却成了污蔑人的群体，而相反的，“老人、富人和当权者”成了污蔑的对象。同样的斗争策略，在今天以关注民谟为己任的部分媒体里仍然延续着。但是，他们忘记了“一旦给事件贴上标签，传播媒介就把它放入一个熟悉了的语境中。”[7]这就是暴力的语言充斥人们的话语当中的战争思维模式的语境。

在暴力语言向行为转化过程中，大字报最广泛的吸引群体参与，暗示和感染在群体中广泛蔓延，瓦解了道德的约束作用，在革命的神圣光环下一切罪恶都不成其为法律上的“罪”，也不成其为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

道德上的"恶"。同时,匿名的效果使个体隐匿,变成"隐形人",个人不用为他的行为负责,于是产生暴力。

历史散去,大字报成了古董,不为人注意,但具有戏剧性的是,在网络时代,"帖子"又继承了大字报的某些特质,从某种意义上可以称为是大字报的电子版。同样的,作为一种传播模式,大字报的许多变体仍旧继续着,其运作模式和深层动因并没有完全消失或者改变。

最后要补充的是,现在的传媒面对的受众更加理性了。而这种理性,不是群体的特征,恰恰是个体的特征。因为,科技的发展和教育的进步在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把传统意义上的群体渐打散了。坐在网络终端往网上发帖子的人,一方面可能和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的人结成同盟;另一方面,他毕竟是一个人面对着屏幕,独立的思考。

参考文献:

[1] 闾小波. 百年传媒变迁[M]. 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 2003: 155.
[2] 李盛平. 中国现代史词典[K]. 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1987: 52.
[3] 罗汉平. 墙上春秋——大字报的兴衰[M].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3: 55.
[4] 刘华蓉. 大众传媒与政治[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5] 古斯塔夫·勒庞. 乌合之众[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4.
[6] 李普曼. 舆论学[M]. 北京:华夏出版社, 1989: 208.
[7] 戴维·巴特勒. 媒介社会学[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89: 38.

Variation in Communication and Power Relation in Da Zi Bao

LIU Ruo-chen
(*Postgraduate Dept. Jin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China*)

Abstract: Da Zi Bao was a phenomenon during a historical period. By giving a definition and searching the root of Da Zi Bao's history, the author concludes that as a model of communication, it's special feature, social function and circumstance caused changes in communication process. It reflects the alienation of communication because of the pressed-forces around it. Some principles that exceed the period out of control ascribe to two important points. One is the reaction between communication and political power; the other is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e crowd, the opinion and the democracy.

Key Words: Da Zi Bao; communication mode; group; public opinion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